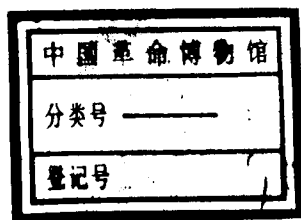


林伯渠文集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伯渠文集.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1

ISBN 7-80039-208-2

I. 林… II. ①林伯渠—文集②政论—作品集—中国—当代③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1941 号

林伯渠文集

林伯渠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博诚印刷厂

850×1168 1/32 25.875 印张 649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208-2/I·588

定 价:(精) 45.00 元 (平) 32.00 元



编辑说明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1905年，他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经过10多年的反复实践，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伯渠同志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留有大量的著作，其中特别是有关党的统一战线、财政经济工作与政权建设方面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史料价值，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著作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本书收入林伯渠同志1907年至1956年的著作共84篇，其中有31篇是首次公开发表。凡是过去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已有完整文稿的，一般都按最初发表的版本和已有文稿排印，只作少量的文字和史实订正，以保持其原貌。只有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几篇报告，因为1958年出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时，作者曾做过某些删节和修改，才根据作者后来的修改作了某些改动。对于收入本书的作者讲话、报告记录稿，则做了文字整理。

收入本书的著作，除了一篇自传以外，其他一律按历史顺序排列。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些著作，我们还作了题解和600余条注释。题解列在各篇首页的下边，注释则按顺序号附在书后。

《林伯渠文集》编辑组

1996年3月

自 传

(1941 年)

我原名林祖涵，号伯渠，又字邃园。生年是前清丙戌岁，即公历 1885 年，现在 56 岁^[1]。籍贯和出生的地方是湖南省临澧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2]。

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父亲在日曾当教书先生，母亲李氏是农村妇女，其父亦是教书先生，现在俱已去世。我的父亲的名字是鸿仪，前清副贡生^[3]，依照湖南的田亩制计算，有祖田 8 石^[4]。37 年离家前，兄弟 4 人各分得 2 石，现弟 3 人妹 1 人已死，家中只余 1 老妻及 3 女并雇用 1 人。

幼年时代的环境，虽住在内地偏僻的农村中，但因当时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点，小农经济已经开始走向破产的道路，而资本主义因素亦开始抬头，所以也波动到湖南的乡村里。由于童年体弱，10 岁时随从父亲在他的私塾里读书，有时也随他到别人的家馆去寄读。那个时候，中日战争^[5]失败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群情愤激，李鸿章、张之洞^[6]富国强兵之说，对一部分青年的吸引力很大。就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于 16 岁投考湖南西路师范学校^[7]，在那里肄业 2 年半。1904 年被师范学校选送到

日本东京弘文学校^[8]留学，至1905年11月因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9]归国。从此我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直到大革命失败后，亡命苏联时才再进学校学习。

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当时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10]风行一时，他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尖锐的批评，这些再加上从日译的欧美书报那里知道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但还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阶级意识依然是模糊的，甚至以为只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当1905年孙中山先生^[11]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同盟会^[12]时，我赞同他的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时间是当年的8月。

除了担任一个短时期的教员外，我一生的职业就是革命。从日本回国后，1906年春天，我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共约1年。这时期管理同盟会宣传品在湖南秘密发行的工作。又因同盟会那时主张边疆革命^[13]，遂于1907年被派至东三省联络绿林。当时马贼头子韩边外^[14]之孙韩登举在吉林，为掩护工作起见，经过亲友汪德植^[15]的介绍，得在吉林省劝学总所^[16]工作，并主办师范传习所及四关小学，借便与绿林来往。这样便在吉林过了3年半，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17]失败后，才又被召回湘。

回到湖南后，在新军与巡防队中做军运工作^[18]。依靠着这个基础，所以湖南能在武昌起义^[19]后首先响应，并宣布独立。1913年春因宋教仁^[20]被杀，便与同盟会旧友在湖南督促宣布独

立，即第一次讨袁之战^[21]。当时我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职，失败后被袁通缉。遂于5月间逃亡日本^[22]。

二次到日本时，曾在东京中央大学一个短时期。当时孙中山先生也亡命日本，他坚决反袁，主张改组国民党，恢复同盟会的精神。1914年，这个新党以中华革命党^[23]的面目出现，我加入后奉命回国，至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因为1915年春筹安会^[24]已成立，袁世凯^[25]谋复帝制的活动日益明显。

护国之役^[26]，湖南的革命力量组成了部队，把袁党湘督汤芑铭^[27]赶走。我在这次事变中，担任了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来谭延闿^[28]当了湖南督军，我任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充政务厅长，那已是1916年的事了。

1917年段祺瑞^[29]非法解散国会，武力向南进攻，我与湘军旅长林修梅^[30]及零陵镇守使刘建藩^[31]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当时的护法之役^[32]。这时我又当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那年秋天把段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33]赶走后，我兼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职，一直到1918年4月参战借款成立，反动力量进攻湖南时，才退军衡州。在那里支持了一短时期便告失败，遂退处郴州将及1年，而后离湘赴粤。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成立了军政府，我到广州是1919年冬天，翌年任大元帅府参议职，年底又离粤赴沪。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

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应该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完全靠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无疑地已证明了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34]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第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记得在湘南驻军时，看见诚朴的农民热心欢迎南方的革命军队，而所谓革命军队其中侵害民众利益的亦复不少，又因受了俄国建立红军的影响，曾想把当时与人民完全没有联系的军队改编成工农的军队，自然在那样的情况下这只是空想。

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月^[35]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36]，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我认识李达^[37]、邓中夏^[38]等人，也在这个时候。1922年因援助黄庞罢工被害案^[39]，曾在香港用共产党

名义发表宣言，许多外国通讯社报纸把它译成外国文字，因为在此以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这样公开活动。

到了1922年冬天，我又到上海去，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此时（中华革命党）已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年仍在国民党部工作，并找张太雷^[40]同志在那里担任干事。年底才去广东，筹备国民党的改组。

国民党是在1924年1月改组的，第一次的国共合作^[41]也从这时开始。当国民党召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出席为代表，还有许多共产党员也当了代表，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国民党秘密党部是由共产党员负责的。改组后，我被派去汉口建立国民党执行部^[42]，同行的本有覃振^[43]，他因故没有去。当时吴佩孚^[44]正当五省巡阅使，汉口是在他的统治下，活动非常困难。记得一遇到革命纪念日，便要在街上戒严。在这样的环境下，执行部虽建立起来了，但工作无法开展。我们执行部的几个干事，如项德隆^[45]、李立三^[46]、许伯昊^[47]、刘伯垂^[48]都是共产党员。后因刘、许被捕，我们住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6月间（遂）离汉返粤。

1924年的下半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全用在筹办监察院这件事上。年底随孙中山先生北上^[49]。次年3月孙逝世后，国民党在北京开执委会，因西山会议派^[50]捣乱，会议没有成功，遂回到广州开会。回粤后，我当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监察院委员，8月廖仲恺^[51]被刺死后，我补了他的缺，当中央党部中执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常务委员只有谭平山^[52]、汪精卫^[53]和我3人，我兼任农民部长^[54]。1926年国民党开第二次大会时，我又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3月20日永丰舰事变^[55]后，我们共产党员都准备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4月间，在惠州成立了第六军^[56]准备北伐^[57]，当时我担任第六军党代表并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在该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我于一时期即担任党团书记。第六军的任务是打江西，10月打下南昌时，武汉也已在国民革命军手中，这时朱培德^[58]当了江西省主席，我们一些当军党代表的都兼任该省府委员。

北伐到了这个时候，内部分化的表征已露，1926年12月蒋介石^[59]召开的庐山会议^[60]，是分化的开始。当时为进攻南京的路线曾发生争执，最后决定了分两路进攻，一路是由浙夺沪攻南京，一路是由九江沿江而下。为了这件事，我于1927年正月回到汉口去，当时共产党要我出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并主张立即进攻南京，因此江右军^[61]不等蒋介石军队会合，先于3月中打下南京。当时蒋介石虽免了总司令职，但势力仍大，武汉国民政府及一部份国民党的中间分子要程潜^[62]捉蒋并解决何应钦^[63]、白崇禧^[64]的势力，我就这样被派至南京与程潜交涉。当时程潜本可以采取紧急行动把事情解决的，但他推说力量不够不敢解决蒋的部队，结果程潜回到汉口去，第六军遂被蒋介石解散。不久就到了7月15日，国共便即分家。

这就是我在大革命时期时代的简单情形。随着革命的失败，联合了叶挺^[65]所部和贺龙^[66]指挥的20军组织了南昌暴动^[67]，我担任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兼财委员会主席。军队后来败退粤边，先在梅县汤坑打了败仗，继又跑至惠来县流沙开会，准备到海陆丰去。就在这时候，我们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只得遣散残余的部队，与贺龙、刘伯承^[68]、彭湃^[69]诸同志化装

逃至香港，时已11月。

当时共产国际⁽⁷⁰⁾有人在香港，找到关系后，因我不能再继续在国内工作，决定派我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苏联的机会，先至上海，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⁷¹⁾、李立三、张国焘⁽⁷²⁾同住。后来又辗转到了日本，等了两三个月才经远东到抵莫斯科。1928年秋天，我进了共产主义大学⁽⁷³⁾。

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布）清党的时期⁽⁷⁴⁾，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全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在我们的学校中，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一部份中国学生的失败情绪很严重，又有几百人是右派和托派⁽⁷⁵⁾，因此在清党时期开展了剧烈的斗争。真正拥护支部正确路线⁽⁷⁶⁾的只有一百多人，我和吴老⁽⁷⁷⁾、徐老⁽⁷⁸⁾是属于拥护支部路线的。一年多的学校生活，对于我的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

学校里过了一年多的生活，又到工厂农场去参观了3个月光景，就到了1930年的夏天，这时候因中东路事件⁽⁷⁹⁾后，感到远东中国工人的组织教育工作做的不够，打算在远东办一个中国的学校⁽⁸⁰⁾，我被派去当教员，教了1年多的书。自己急于回国，因而借着到南俄去养病的机会回到莫斯科去，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商量回国的事情。经过批准后，我又回到远东去，从海参崴搭舰回沪。这时已经是1932年下半年。

在上海只逗留了一个短时期，我便于1933年3月进到中央苏区⁽⁸¹⁾去。路线是由汕头经过大埔至苏区的边境，因为封锁很严。在晚间偷渡时曾被搜山的击伤了手。到了瑞金后，我担任的工作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一直

到1934年10月随军长征出发时又调任没委会主任⁽⁸²⁾及总供给部长。

1935年冬天随红军到达陕北后，先抵吴起镇，继到瓦窑堡。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⁸³⁾成立，我当财政部长。1936年冬至1937年春曾任办事处主席，特区政府时也担任主席之职。抗战后，担任大后方统一战线工作，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这是我将近40年生活与斗争的缩影，它是与中国这个世纪里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而在这多年革命者的活动中，又有一半时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过着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在党内，我担任过小组长、党团书记、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五中全会时被选），现在是中央委员兼边区中央局常委。入党后从未脱离过组织，没有犯过错误，也没有被捕过，或是对党的路线发生怀疑。

我个人离家日久，与家乡关系已很疏远。家中的妻子伍崇贤，是1910年在东三省结婚的，所生一子林秉益现在中央局工作，两女在苏联学习。现在的妻子李俊是共产党员，在边区银行当会计。其他的社会关系虽多，但已不是什么私人的友谊，而变成了公共的关系了。

对自己的批评是欠缺敏感，尚有责任心，虽无特殊才干，但能够把握住大的方向，缺点虽有不少，然而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是严肃的，在临难不苟这点上是当之无愧。上次国共分家时，程潜曾想说服我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加保护，但我未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从苏联秘密回国后，明知非常危险，除

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说明了在严重关头自己还能站得稳脚，因而不致落在时代的后面。

回忆过去，自己庆幸着此生并未虚度，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瞻望将来，自己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在布尔塞维克的旗帜下前进。

根据中央档案馆藏作者亲笔签名并校订的油
印稿刊印。

目 录

自传 (1941 年)	1
吉林劝学总所兼宣讲所成立缘起 (节录)	
(1907 年 10 月 6 日)	(1)
请保护征收金融各机关	
(1917 年 12 月)	(5)
《林修梅遗著》跋	
(1921 年 12 月 2 日)	(7)
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	
(1926 年 5 月 1 日)	(9)
关于中国国民党党务现状的报告	
(1926 年 5 月 15 日)	(14)
附录：农民部工作报告 (由 2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	
(1926 年 5 月 18 日)	(19)
湖南的土地问题	
(1927 年 5 月)	(32)
发动群众节省谷子，支援革命战争	
(1933 年 5 月 20 日)	(35)

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与建造谷仓问题

(1933年5月27日) (37)

致彭德怀的信——关于巩固陕北金融的政策

(1936年7月15日) (40)

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

(1937年5月) (43)

抗战中纪念“五卅”

(1938年5月23日) (53)

伟大的七月

(1938年7月1日) (58)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来的政况

(1938年7月7日) (62)

国民参政会之观感

(1938年8月20日) (75)

关于改议会为参议会通电

(1938年11月25日) (85)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1939年1月) (87)

关于陕甘宁边区管辖区域给国民政府的呈文

(1939年2月12日) (130)

发挥陕甘宁边区伟大的力量

(1939年3月28日) (132)

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收获

(1939年4月7日) (135)

为揭露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致蒋介石等的公开电

(1939年5月7日)	(141)
团结与民主	
(1939年10月5日)	(143)
我们需要的宪政	
(1940年1月6日)	(146)
向老战友吴玉章致敬	
(1940年1月15日)	(150)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报告	
(1940年3月9日)	(153)
论新民主主义政治	
(1940年3月12—13日)	(173)
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1940年12月25日)	(206)
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	
(1941年2月19日)	(209)
抗战中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	
(1941年5月30日)	(218)
中国共产党与政权	
(1941年7月1日)	(225)
抗战改变了边区的一切	
(1941年7月7日)	(229)
四年抗战与目前任务	
(1941年7月25日)	(232)
荏苒三十年	
(1941年10月10日)	(236)

目录

边区财政经济政策

(1941年10月27—28日) (239)

边区政府工作报告

(1941年11月8—9日) (254)

《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序

(1942年5月1日) (278)

关于辛亥革命

(1942年10月5日) (279)

简政整政问题

(1942年11月4日) (285)

关于财政经济问题

(1942年12月23日) (295)

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

(1942年12月) (306)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闭幕词

(1943年1月14日) (316)

永恒的记忆——沉痛悼念刘志丹同志

(1943年4月23日) (321)

农村十日

(1943年5月30日) (324)

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

(1943年7月2日) (331)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

(1944年1月6日) (335)

我们应该把拥军工作做得更好